



甘子日报
GANZI RIBAO

康巴周末

康巴人文

2026年3月27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:南泽仁 校对:刘娅灵
版式设计:边强

6

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
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
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
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

五色海

【第1186期】



友、一名通司(向导),担任尖兵开路,为后续部队探查路况、排查险情。我们刚摸到叛匪盘踞地点的边缘,放哨的土匪见我们人少,以为有机可乘,想要生擒我们,便从四面向我们包围过来。我们临危不乱,立即分头向外突围。就在这危急关头,后续主力部队及时赶到,身后传来了机枪点射、连射的阵阵枪声,支援我们突围。紧接着,3发迫击炮弹精准落在扑来的叛匪人群中,匪众应声倒地,剩下的叛匪见状,纷纷溃败逃窜。

石渠多为平川大坝地带,叛匪无处藏身、无力抵抗,战斗仅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就胜利结束。战斗结束后,我们几人缴获了叛匪的几支枪,还成功赶回来了被他们抢走的牦牛2000多头、绵羊3000多只,战果十分丰硕,既打击了叛匪的嚣张气焰,也为群众和国家挽回了巨大损失。

雪域忠魂祭战友

雅鲁江战斗前,队长派我带领一名战士,前往石渠县东区(与甘孜县接壤),调查各民改工作队队的社会稳定情况,了解当地的安全形势。我抵达第一个工作队后,当地干部就焦急地向我报告:一天前,几名叛匪残忍杀害了两名工作队队员,抢走两支冲锋枪后,逃上了山。

我立刻赶到事发现场,只见两名烈士的鲜血染红了茫茫雪地,场面令人痛心。当时正值冰天雪地的严冬,气温低至零下30度,水瞬间就结成了冰,我们又没有任何挖掘工具。可如果不掩埋两位烈士的遗体,既是对死者的不敬,让他们抛尸荒野,我们也于心不忍——更何况,他们是为了革命事业、为了保护群众,被叛匪残忍杀害的。

于是,我和战友下定决心,烧干牛粪解冻土层,让烈士们入土为安。可牧民们起初不肯卖给我们牛粪,他们担心叛匪回来后,说他们同情工作队,进而遭到报复。我一边耐心地做牧民的思想工作,讲解革命的意义,解开他们心里的疙瘩,打消他们的顾虑。最终,牧民们同意卖给我们,我当即买下了10袋牛粪,架起柴火焚烧,烧了两个多小时,才将坚硬的冻土解冻。

随后,我和战友用双手刨出一个土坑,又在附近的商店买来12尺白布,小心翼翼地裹好两位工作队队员的遗体,将他们平平稳稳地放进坑中,覆盖上热土,再在土上铺上一层白雪,仿佛为烈士们盖上一层洁白的被褥。我们站在墓前,郑重地敬了一个军礼,以此告慰烈士的英灵。

安葬好烈士后,我们立即出发追击叛匪,想要夺回被抢走的枪支。可叛匪骑的是马,速度极快,我和战友只能步行,无论我们走得多快,也赶不上骑马的叛匪。我们一路追击,一直追到雅鲁江边,才从当地群众口中得知,那两名叛匪已经渡过江,逃到了甘孜县境内。无奈之下,我们只能放弃追击,返回部队归队。

忆往事,至今我依旧历历在目。我从未向儿女们讲过我从军的往事,下田坝的乡亲们更不知道这段尘封的经历。20世纪90年代,我落叶归根,回到了老家。闲暇之余,才慢慢整理出这段尘封了几十年的从军经历,留作自己纪念,也为百年之后,留一个念想。

保卫了县委书记和工作队干部的安全,展现了非凡的应变能力和战斗勇气。

平叛大军驰援紧急

后来我才知道,1959年初,甘孜州除泸定、丹巴、九龙等少数县外,其余各县大都发生了武装叛乱。石渠县最边远的白日扎一带,外县叛匪与当地匪帮相互勾结,纠集人数达上万之众,他们早已向共产党、解放军和新生的人民政权发起了武装挑衅。不久前,石渠的叛匪就曾打死一名执拗的解放军战士,抢走了他的枪支。在牧区和乡村,不断传来坏消息:区乡工作队被叛匪袭击包围、干部遭暗杀、牧民与国营牧场的牦牛、绵羊等牲畜被抢劫,各地纷纷请求县中队派公安战士前往解围。

当时,要对付上万名叛匪,必须依靠主力解放军。我们县中队的主要任务,是坚守监狱,防止在押犯人越狱或暴动;同时保卫县委、县政府机关,以及卫生院、邮电所、学校、粮站等关键部位,严防遭到叛匪袭击。就在这险象环生、形势危急的时刻,西部战区调集兵力,配合甘孜州骑兵团,向叛匪盘踞的地区发起大规模平叛作战,解放军平叛部队正日夜兼程赶赴石渠。而在主力部队尚未抵达的这段时间里,叛匪更加嚣张跋扈,接连制造事端,局势愈发严峻。

捍卫县城战斗

1959年,石渠全县爆发土匪叛乱,一二百名挥舞着藏刀、手持叉子枪(藏式火绳枪)的叛匪包围了石渠县城。好在我们县中队早有战备,提前做好了防御部署:县城两个浑圆山丘的至高点上,两个碉堡各有一个班配备重武器固守;县委、县政府大院的3个碉堡里,公安军战士荷枪实弹站岗值守,发现匪情后,立即紧急鸣枪示警,提醒全城戒备。

一天,部队营房外突然有老百姓高声呼喊:“土匪进城了!快躲藏起来!”队长和指导员齐声向我下达命令,让我带领一个班,立即把土匪赶出城去。我们不敢耽搁,立即冲出县城,朝着手持枪支、挥舞长刀的叛匪猛冲过去,长短枪、机枪一齐猛扫,当场就有3名中弹的叛匪倒地。众匪见我方冲锋枪、机枪的火力死死堵住了他们的去路,吓得魂飞魄散,转身狼狈地逃奔出城。此刻,通讯员传来命令,让我们趁机把叛匪从国营牧场抢走的牦牛、绵羊赶回来。我们乘胜追击,最终赶回牦牛50多头、绵羊百余只。这些牛羊,是县级干部、县中队及各单位的主要肉食来源,对维持大家的生计至关重要。此次战斗,我们班无一人伤亡,圆满完成了保卫县城、追回物资的任务。

参加雅鲁江平叛战斗

盘踞在雅鲁江西岸石渠境内的一股叛匪,长期围困区乡民改工作队,抢劫了大量牦牛、绵羊,还多次袭击并杀害工作队干部,无恶不作。平叛部队抵达石渠后,由于不熟悉当地地形、不懂藏语,再加上当地群众都身着藏装,很难分辨谁是叛匪、谁是普通牧民。于是,县中队抽调战士配合主力部队进山平叛。

队长派我带领两名战

要文件和一大叠信件。前指又交给我们带回石渠的大半布袋机要文件、一捆平信,还有三箱银圆与子弹。次日早饭后,我们正忙着给马匹上驮子,前指办公室主任突然叫我立刻到他办公室。我喊了一声“报告”走进办公室,主任神色凝重地说:“刚接到电台报告,昨天甘孜州好几个县都发生了叛乱,色达、邓柯都乱了,石渠也很危险。”他接着说:“你们县委常委在康定地委开完会,正在返回石渠的途中,今天你们不能走,等他到了,你们负责护送常书记回石渠。”

常书记一行十二人抵达前指后,电台曾通知他从成都绕道青海玉树天河返回石渠。可与青海方面联系后才得知,青海紧邻石渠的玛多、称多、玉树三县也已发生叛乱,土匪控制了县与县之间的所有关口要道。常书记当即放弃走青海的方案,决定冒险走我们来的路线,秉持“走一步、看一步,积极应变”的原则,伺机返回石渠。

我们一行共十七人,其中有三名女同志,还有九名新分配来的民改工作队队员。他们第一次踏上高原,心里既害怕又紧张,整个队伍的气氛十分凝重。我带着向导(通司)走在最前面开路。第四天,我们走到石渠西界与青海交界的奔达一带,行进在浅丘宽谷之中。正要翻过一座浑圆丘顶时,前方坡地上突然冒出黑压压一片土匪,粗略估计有五百多人,彻底堵死了我们的去路。

我走在最前头,立即向常书记报告,并建议趁土匪尚未开枪,我们先声夺人、虚张声势。我让向导大声喊话,声称我们是去往青海的解放军大部队先遣队,只是路过此地,与他们无冤无仇。同时,我小声叮嘱同行的十七人,彼此拉开距离,不要挤成一团;一旦听到枪响,有人倒下,立即就地卧倒,最大限度减少伤亡。

土匪见状,喊话让我们过去两个人说明情况。常书记让我带上向导前去接触。为表示我们的“诚意”,我把枪交给身边的战友,独自爬上浅丘,见到了匪首。我让向导把我的话翻译成藏语,一口咬定我们是青海玛多县人,走这条路只是因为比其他路线更近;并故意放出狠话,说我们身后有一千多名解放军进军青海,其中还有一个营的骑兵,如果他们胆敢阻拦、开枪,就等于给后方的大军报信,等到骑兵一到,他们必将死伤惨重,而我们青海人并不想与他们发生冲突。

匪首果然信以为真,说道:“你们不开枪,我们不开枪,你们走吧!”众匪纷纷让开道路,我们一行十七人有惊无险地脱离了险境。两个多小时后,土匪不见解放军大部队赶来,才发觉上当了,想要追赶我们,但天色已经黑了下来,根本追不上。我们不敢有丝毫停留,不下马、不吃饭、不休息,连夜急行军。第二天下午,我们十七人全部安全抵达石渠县城。

常希文书记(后调往泸定,1963年8月—1967年1月任泸定县委书记)大步走进县委大院,对着前来接应的同志激动地说:“我终于活着回到了石渠,见到你们了!”当时中队还不便于记功,常书记和中队长便在大会上口头表扬了我,称赞我机智应对、勇挡叛匪,成功

追捕要犯

1953年,我所在的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,继续驻防泸定。1954年的一天,连长派我带领3名战士前往西康省雅安专区天全县,追捕在泸定县镇反运动中逃脱的要犯高润生。1949年前,高润生曾在某县担任旧政权公安局局长、武装队长,还曾任泸定县国民党政府教育科科长。此前,泸定公安和民兵曾对其展开搜捕,但他早有防备,成功脱逃,先躲到羊圈沟沟尾的东灵山庙子。他自知此处难以久藏,便翻过二郎山,逃至天全县新沟,给当地一名孤寡老人认作干儿子,以此掩盖身份,蒙骗了当地的干部和群众。后来,有熟人在新沟认出了他,随即向泸定县公安局举报。我们追捕组抵达天全后,迅速侦察到高润生的藏匿地点,随即请求天全县公安部门协助,组织上百名民兵进山搜捕。高润生无路可逃,最终束手就擒,被我们押解回泸定,依法归案伏法。

石渠县城不像个县城

1955年8月1日,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,我被编入距离老家下田坝一千多里外的高原石渠县中队。我从康定乘汽车抵达甘孜县,再换乘马匹、步行前行,历经一周时间,才终于抵达陌生的石渠县城。我环顾这座县城,怎么看也不像想象中的样子。宽阔的平坝上,只建有一座一搂一底、共十余间房屋的土墙四合院。院子的东、北、西三面各有一座土碉堡,附近散落着几幢矮小的土坯房,稍远处还有十几顶黑色帐篷,人烟十分稀少。我最关心的是通邮情况,有同志告诉我,这里的邮件一个月才来一次。日常早餐是清茶配糌粑,正餐顿顿不离萝卜和莲花白;民间交易仍在用银圆、藏币;夜里禁止单独外出,因为常有土匪出没。那时的石渠,几乎与外界隔绝。没想到,我从抵达石渠的第一天起,到1964年2月转业到成都公安离开,在这座平均海拔4000米的高原县城,整整生活、战斗了九年。

勇挡叛匪脱险境

1952年7月,南下干部常希文被西康省委任命为石渠县军事代表,后来又担任中共石渠县委书记。1956年3月的一天,县中队队长派我带领四名战士到甘孜县执行执勤任务。队长说我年轻,有文化、精于能吃苦、遇事善应变,派我出门执行任务让人放心。我们五人骑马携带县委机要文件出发时,队长特意叮嘱我:“机要文件关系党和国家及军事机密,比你们的性命还珍贵。人在、文件在!万万不能丢失,更不能落入叛匪手中。”这份嘱托,让我深深明白,任务重于泰山。

经过两天半的行程,我们抵达康定地委驻康北中心甘孜县前线指挥部(简称“前指”),上交了机

一人参军 全家光荣

1950年3月,泸定解放。1951年2月16日上午,村农会主席李光聪为我胸前戴上红绸大红花,众乡亲敲锣打鼓相送,父母和新婚妻子含泪伫立,陪着我走出村子,奔赴军营,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。我当天就到了泸定县兵役局(后改编为县武装部),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营三连,终于圆了我的从军梦。我的父母、妻子也光荣成为军人家属。参军当年过年时,乡人民政府在我家大门上悬挂了一块“光荣家属”木牌,真正是“一人参军,全家光荣”。

鱼通剿匪冲在前

1951年6月,鱼通土司甲安仁勾结国民党特务蓝希夷、刘野樵发动反革命暴动,抗拒土地改革,向土改工作队打响了第一枪。甲匪还胁迫当地数百名青壮年上山为匪,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。在匪焰嚣张、局势危急之际,我所在的部队编入康定军分区鱼通剿匪大军。6月14日,解放军向叛匪发起猛烈进攻。刚结束军训的我,第一次亲历真枪实弹的战斗,子弹在头顶、耳边呼啸而过,起初心里十分紧张惧怕。经过两三天的激战,土匪节节败退,我军步步进逼匪巢,我心中的恐惧与紧张也随之消散。历经14天的激烈战斗,匪首甲安仁、杨维周被歼灭,被胁迫的群众得以遣返回乡,重新投入农业生产。鱼通剿匪的战斗,锤炼了我的胆魄,提升了我的实战军事技能,让我从一名懵懂新兵快速成长,也更加坚定了我的革命信仰,牢固树立了军人不怕苦、不怕死的战斗精神。

红色印记

尘封的从军往事

邓明贵

